



今日中國的教會

與

國家

(續)

沙百里著

前文提要：面對目前中國對待宗教的態度，我們不禁會問：

1. 中國的宗教是否會回復到以前的情況？ 2. 中國會否保持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苛刻批評？ 3. 目前中國宗教界所鼓吹的獨立自主是否一項真正的突破？作者爲了回答第一個問題，在前文介紹了中國目前的宗教政策、有關的政府架構、宗教組織和情況，也把傳統的政教關係與現在的情況作了一番比較。本文是作者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答覆。

共產主義與宗教

無神共產主義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一點是它的力量所在，亦同時是它的弱點。

在今日的中國，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它配合了中國的禮教。這種整合是以俗世的和反宗教的形式出現。由於儒家基本上是人文主義的傳統。因此，能被納入這個歷

史的新階段中，可以適應這個專注於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新世界。對中國共產主義某些特質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馬克思主義與宗教的關係，以及它在二十世紀的演變。

馬克思的科學主義

假如在中國有基督宗教的傳統的話，我相信這種宗教亦會類似孔德的實證主義中的宗教。中國人崇尚研究、學問和技術，而且賦予它們一份高度的倫理價值和近乎魔術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因為傾向托洛斯基派，他的名字早已在中共歷史書中被刪去，但最近又被再度提出，原因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期間，他懂得怎樣熱烈鼓吹「科學」與「民主」。他的同志從「新青年」雜誌中，發現到可以運用現代科學，作為批評舊社會、儒家倫理觀和民間宗教的理想工具。

當時的另一位英雄人物胡適，也對科學方法和科學效能懷着極為狂熱的態度。他說：「科學堪受人們的崇拜」，但他對科學的興趣偏重於「方法」，而非一般性的「理論」。胡適拒絕運用所謂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去從事社會改革。乘杜威教授於一九一九年訪問中國的機會，他發表了聲明：「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註十）

另一方面，李大釗却維護馬克思主義，視之為歷史的和社會的科學。他認為歷史決定論將人從對外來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中解放出來，因而使人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社會。對他來說，馬克思主義給歷史提供了最好的科學定律，而這歷史定律指出無產階級必然取得最後勝利。

因為馬克思主義把人文主義、民間的靈感與科學的價值結合一起，故此，中國的青年採用了它作為改變中國的最適合的革命理論。

今日中國對馬克思思想中人道主義的探討，也許會引發中國人去反省馬克思主義中源自基督宗教的教義：人性尊嚴、人是勞動的主體，而非工作的對象；由聖經中先知預言所引伸出來的無產階級的救贖性使命，批判着一切宗教上的虛偽。由此觀之，似乎馬克思主義之誕生，從一開始便受到基督宗教的影響！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純粹是科學，那麼，為何它一定要求「信」與「自我犧牲」？既然實用批判方法對修正舊理論是不可或缺的，那麼，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攝取了宗教的態度，它又是否能夠保持自己的實用批判方法？宗教信仰本是人生命中的事實，它亦曾經被詛咒為虛幻，但它現在却以另一種俗世的形式出現，這種「宗教」其實比真正的宗教更危險，因為它賦予有限而短暫的事物一種絕對的價值。

唯物主義的理想

過去，有些傳教士曾遭受洗腦，因為他們拒絕承認唯物論的成就。在他們的心目中，接受這樣的立場無異於拋棄了精神界和否認天主。的確，他們這種立場并非是施刑的共產黨員所能領悟的，因為共產黨員視唯物主義為無可比擬的理想。為他們看來，唯物論本身便是科學最先的成就。因此，雖然BARON HOLBACH及「科學百科全書」中的唯物主義理論已被後期的辯證唯物論所修正，但這二者在中國仍保持着相當的權威性。唯物主義不僅是科學的成就，而且是

一種信仰——相信人類的進步以及經濟的發展，並相信人可以憑己力改善一切生活條件；拒絕接受唯物論就會淪為唯心論和宗教幻想的犧牲品。

今日的共產黨員怎樣去肯定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享有同等地位？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可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並未能界定精神文明的實質意義，只是從經濟角度將精神文明描繪為個人為公益所作的犧牲。

到底這種犧牲精神從何而來？是否人本身已具備了真理、愛和正義的泉源，使人可以大公無私地為公益而努力？可是，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承認在人性內有任何超越的精神價值存在。

也許，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唯物主義有新的註釋，這種唯物論對中國傳統中人性追求完美境界的思想可以兼容並蓄，從而使物質與精神的對立得以局部瓦解。在此，我們強調「局部」，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並未完全承認「精神」為「超越界的召喚」。個人的自我超越以及整個人類的精神命運乃源於宗教經驗，在馬克思的時代，他所看見的，只是這種宗教經驗的歪曲表達。馬氏一方面責斥宗教，但另一方面又根據自己的革命理想以科學的名義把宗教攝取回來。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一類詞彙，都並非來自中國的傳統思想。那麼，為何不乾脆跟隨儒家的傳統，加以「正名」，用更適合的字眼來表達這兩個詞彙所要表達的事實？

革命的行動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給各式各樣的衝突和血戰撐腰，以下是幾個具體的例子：立國初期的



農業革命、以推行社會主義為名而組織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以推行一種民間新文化為名而打擊知識份子和宗教信徒的各種行動。這一切無非都是出自狂熱的敵對情緒。

難道這些血腥大屠殺是「歷史的科學定律」所註定的？相反，它們仿如受「默西亞靈感」所推動的群眾運動，這類運動在中國的整個歷史中屢見不鮮。毛澤東利用這些運動來支持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毛氏深信群眾的創造力，並認為農民的「貧困」是戰鬥精神的必要條件。在貧農及紅軍的這些鬥爭過程中，「無產階級勝利」和「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便代替了「和平」與「和諧」的傳統理想。無疑，黨的理論家對這些口號的意義有不同的了解，但在一般群眾的心目中，這些口號具有宗教般的魔力。

研究農民戰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家，都強調着叛亂背後的經濟原因，而低估了心理因素和宗教動機。倘若我們較客觀地評估這種因素，將有助我們更深地了解共產主義

的行動。到底在「崇毛」和擁護「毛語錄」的行動中，那份近乎宗教的狂熱扮演着怎樣的角兒？馬克思主義揚棄宗教，把宗教納入幻想世界中，因而對宗教的實況產生誤解。事實上，倘若病癥尚存，又豈可佯裝康復呢？

國家的意識型態

值得慶幸的是，自從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下台以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較為理性和實用的路綫。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的強盛和繁榮，不論在中央政府抑或在地地方行政機構，黨都變成了是經濟發展和生產增長的僕人。正如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內的當權派一樣，黨也運用剝削權力，但不同的是，既然是「人民」政府，所以說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剝削人民；但另一方面又說已清除了一切剝削。這許多年來，儘管領導人埋頭苦幹，整頓幹部用心良苦，事實上，許多中級和地方的幹部都利用權力而中飽私囊，許多報紙都曾經在不同程度上揭發了他們貪污的情形。但這些錯誤往往歸咎於來自西方的不良影響，其實，應該歸咎的倒是黨所自誇已滅盡的舊「封建」習慣。

共產黨既肯定實用主義的意識型態、關注國家的秩序與紀律，又以實用的眼光來判斷一切事物的價值，故它把一切宗教團體均納入政治制度，但同時又清除那些對自己無益和危險的成份。自從一九八五年以來，雖然在國家的控制之下，宗教不斷宣佈獨立自辦，但黨還是容許各宗教憑藉國外關係而引進外匯，以協助國家的現代化。特別是基督徒，過去他們曾因與外國聯繫而遭受迫害，但現在却被邀去取得自己教會的支持，以助教育及醫療的服務。不過，被邀請到中國來

的人，清楚知道自己不能從事傳教活動。再者，他們既然是義務的基督徒，就不該計劃向政府要求薪金，至少在開始的一年是如此。（註十一）負責引進外國援助的「愛德基金會」組織，已在基督教人士方面開始運作了。在天主教方面，同樣的工作也已通過明愛組織在中國展開。事實上，對人類的發展提供非牟利的援助，亦是教宗和大公會議的訓導之一。但是對於這種既割離他們與羅馬的關係又剝奪他們與普世教會交流的制度，天主教徒又可以支持到什麼程度呢？一位受到中國尊重的法國外交人員說：「在那裏，他們把天主子女當做蠢材。」

對那些尊重教宗的權威、拒絕愛國會的分離立場，並與國外教會保持聯繫的中國天主教徒，統戰部和地方官員常找他們的麻煩。中國聲稱保護宗教，而隸屬於國家的愛國會則扮演着仿似歐洲中世紀的「裁判所」的角色，把「犯法」教友交與治安機構，以不服從社會秩序之名拘禁他們。這些方法只會引起人們對基督徒的同情，並促成皈依的浪潮。領導人常抱怨人民對黨和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事實上，人民對擺在眼前的事實，已不存有幻想。

民間的基督宗教

數百間天主教堂再次開放，確實令教友不勝雀躍。二十多年來一直不能領受聖事，一旦能夠參與彌撒，在天主台前引吭高唱，並在重修的聖堂裏領受聖體，信友們自然都高興得熱淚盈眶。但許多人無注意到，這些聖堂是在天主教愛國會的幫助下而重開的，因此，許多本堂神父爲了保障自己團體的平安不得不向愛國會、政府及黨稍爲表示感謝。亦有些較強硬的本堂神父不肯在門上張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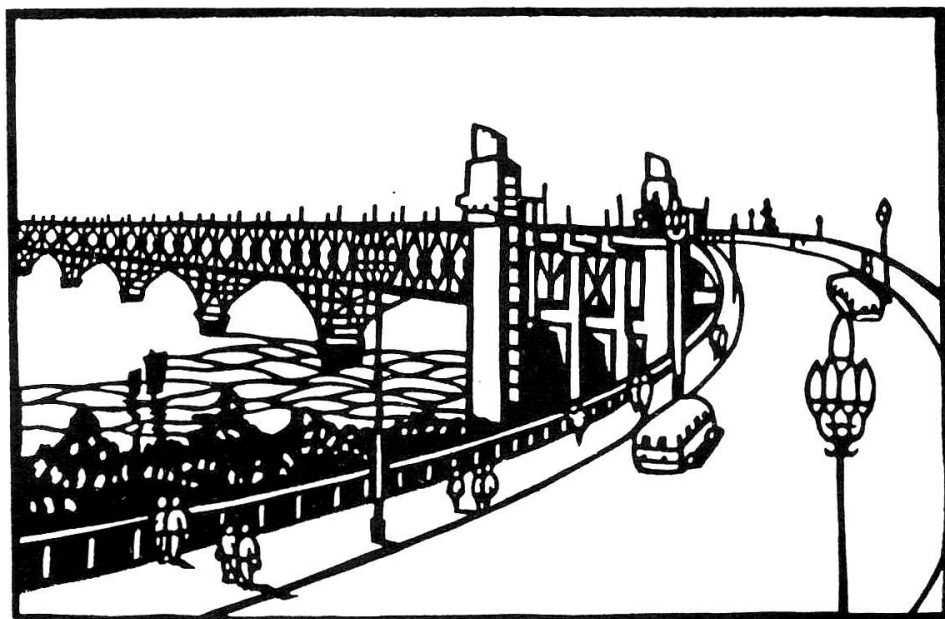
愛國會的招牌。教友如果聽到聖堂中有「好神父」時，就蜂湧而至。有時候，有些聖堂只有一位已結婚的神父，且是眾所周知的愛國會神父，以前曾經告發過其他神父或教友。進入他所負責的聖堂的信友，便寥寥無幾了。絕大部份的信徒繼續在自己家裏和家人一起祈禱，並請神父來家裏秘密舉行聖事。

一般而言，最活躍的要算是散居於鄉間的教友了，在那裏愛國會的干預較少，而地方幹部又不大理會。此外，由於各地的環境不同，所以宗教自由政策的實施亦頗具彈性。有時，當全村以宗教自由的名義而組織遊行或朝聖時，孤立無援的地方幹部對這種情況亦很難予以控制。有些幹部甚至自己也參加了教友的祈禱行列，這些幹部事後往往難免不受到上司的斥責。奇怪的是，在這些非愛國會的鄉民裏，中文彌撒開始推廣。反而，在城市中的愛國會聖堂裏，却仍保留着古老的拉丁彌撒。雖然在彌撒進行時，信徒仍然背誦他們所能記憶的傳統經文，但他們實在願意與普世教會結合，也不理會那些拒絕教宗權威的愛國會主教的指示。

這些被剝奪了一切的天主教團體，甚為虔誠。學校、孤兒院、修女院以及其他宗徒事業都早被政府所佔用，許多書籍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遭毀滅。中國的基督徒從未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基督的十字架和福音中的貧窮。他們的信德和望德都很堅固，他們在新政策中又組織起來，並無意放棄他們曾經為之而受苦的一切。在他們當中產生了不少會士和司鐸的聖召。雖然如此，他們的確是卓越的國民，愛國守法，而且有時因努力從事生產而被表彰為模範。他們對經濟和社會的種種貢獻，就是官方文件亦無法緘口。

至於基督教福音派方面，其作證和皈依的熱潮也相當興盛。家庭聚會、聖經研習、青年受洗、團體領袖的訓練等，與日俱增。

教會在這卅年間固然遭受了巨大的物質損失，但在精神方面却不無收獲：她終於擺脫了權力和財富。共產黨過去批評教會與剝削的權勢串通，這批評並非全無理由，但可惜自從那時起，共產黨便取代了這些權勢；若根據同樣的邏輯推理，他們亦面臨着與一般民衆隔離的危機。他們知道這危機，所以



現在設法致力與教會謀求統一。但由於他們反對教宗的權力，干預了天主教的教義，所以他們對天主教方面所付出努力並未收到很大的效果。

獨立性與普世性

今日的中國對當今世界頗為開放。這是實用主義的開放，目的是為了達到四化的需要。十九世紀的老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仍浮現在中國知識份子的腦海中。被今日共產黨思想所感染的倫理和文化領域，在許多方面還是關閉着的；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的新嚐試，很快便遭到以四個堅持為理由而受到鎮壓。（註十二）

無疑，不許中國天主教徒與教宗維持聯繫的政策，便是這種封閉態度的具體表現，因為政府要杜絕一切可能威脅到它的秩序的東西。梵蒂岡與台北政府保持關係的政治理由是一個難以立足的藉口，因為謀求國家的統一，沒有比讓天主教徒自由往來於台灣與大陸之間來得更有效。與教會正式建立關係，必會產生一些連海關檢查也難以控制的交流。

所以，一方面我們固然要反省這種畏懼外國干涉的情緒本質；另一方面也該探索一下與普世教會恢復交流所能產生的益處。

害怕外國的干涉

梵蒂岡被認為是一個濫用權力干預中國內政的外國權力。這項控告乃基於目前中國政府的經驗，及其對西方教會史的研究。

譴責共產主義

教會對無神共產主義的譴責，中國人知之甚詳，尤其對中國共產黨所作的個別譴責，例如：五十年代教宗庇護十二世的三封通諭。那三封通諭禁止教友參加共產黨的各種運動和加入天主教愛國會，并指出未經羅馬同意而祝聖主教是違法行為。（註十三）

自從政府允准信眾享有某種程度的宗教自由後，教宗叮囑中國教友勉力對國家盡忠職守，並承認中國目前推行現代化政制的功績。教宗亦把無神主義學說和政府的制度分開，教友不該接受的是無神主義，但如果政府的某些措施是為了公益，教友則應予以支持。

梵蒂岡真有帝國主義和反動的本質嗎？我們實在看不出何以幅員廣大的中國竟會對一個面積僅相等於北京天壇廣場的國家產生恐懼。無疑，這暗含着所謂教宗的精神權力與帝國主義的權力互相勾結的問題。但是，中國現在不正是與從前被列為帝國主義的歐美列強維持着很好的關係嗎？另外，共產黨忽視了天主教在第三世界的巨大進步和發展。當教宗訪問非洲和拉丁美洲時，他所得到的待遇遠超過任何一國的元首。

今日，我們實在看不到梵蒂岡有何反動的表現。教宗支持各種國際性大機構所倡導的教育、科學、勞工和反饑饉、以及正義與和平等運動。

西方歷史中的權力衝突

在中國所了解的教宗的歷史，是教會的權力高於俗世的權力，以及教廷聚斂一切民族的財富。其實，若我們較為客觀一些，我們會發現在教會的歷史上，早期亦有不少殉

道的教宗，他們亦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因為拜占庭希望結合政權的力量，就如同古時中國儒家和政治結合一樣。中世紀的神權政體在信教的歐洲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在那裏俗世的和精神的權力都服從一個最高主宰的法律。基督宗教是以神為中心；而中國的儒家政權，雖然亦敬天，却是以人為中心。

法國大革命時期為神職界而制訂的公民憲法，被一批神父欣然接受。他們期望教會捨棄自己的特權，好能恢復福音精神。（註十四）拿破倫於一八〇一年與教宗所訂的協議，可使我們對照一下中國的情形：法國當時的政權緊緊地控制着教會，以確保秩序和倫理道德。可是當國家表現過份侵略時，就不可能再有什麼妥協，最後，在一九〇五年，政教終告分道揚鑣。新興國家大部份沿着這條途徑去解決問題。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奧國的「若瑟夫主義」成為俗化了的「神聖羅馬帝國」對教會所作最後的一擊。國家向教會奪權的情況，在一七八三年達於頂峰，當時所有的修道院全被關閉。

對於啓蒙運動時代或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各俗世政權的態度，我們必須在基督宗教歿落的背景中來了解。中國在這方面可以看出一些和自己的宗教政策相似的地方。然而，在儒家的中國裏，從來沒有宗教權力的存在，而它和梵蒂岡的關係又純粹是另一回事。天主教徒在中國只是一小撮人，而教會今天却捲入了政權的旋渦之中。梵蒂岡因回應世界各國不同情況所簽訂的協議，是需要分開來分析的。這些協議都是為了釐定教會的地位，既要符合地方權力，亦要確保宗教自由。許多問題，尤其是關於委任主教一事，都可能有多種解決的方法。梵蒂岡國務院秘書長ACHILLE SILVESTRI 總

主教最近在談論中國問題時，就曾提及這些事。（註十五）

教會的至公性

教宗是一位精神領袖，所有天主教會的主教都與他有聯繫，他的職務是維護教會的統一和道理的純正。如果他就家庭、勞工和社會等問題頒佈訓示的話，那是爲了要指出：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夠協助人性全面的成長和促進真正的和平。藉着與教宗共融合一，教會才有真正的「至公性」或普世性。基督教信徒也相信基督喜訊的普世性，可是他們的教會往往與國家政權聯繫，至少在他們的創立時期是如此。

今日尊重教廷權威不但不會加給地方政權任何壓力，反而會有助於它們促進人類發展的工作。

尊重倫理和政治的自治權

哲學家JACQUES MARITAIN 在其著作「整合的人道主義」中，曾經仔細分析了古代西方基督宗教怎樣演變至認同俗世社會的暫世價值。他肯定人類對自主的醒覺，亦同時強調人類必須對超性的命運開放。對神的信仰並非以外在的法律壓力來表達；信仰就好像一個召喚，邀請人去追隨那些聖人和英雄的步伐，繼續推進人類的發展。在這方面，他繼承了柏格森的理論。柏氏認為宇宙是憑着一點既屬物質又屬精神的生命火花而不斷創造和進化。一個把自己封閉在既定的習慣中的社會，總是不靈活而傾向於僵化的；相反，只有對精神界的召喚開放，社會才有創作性，才能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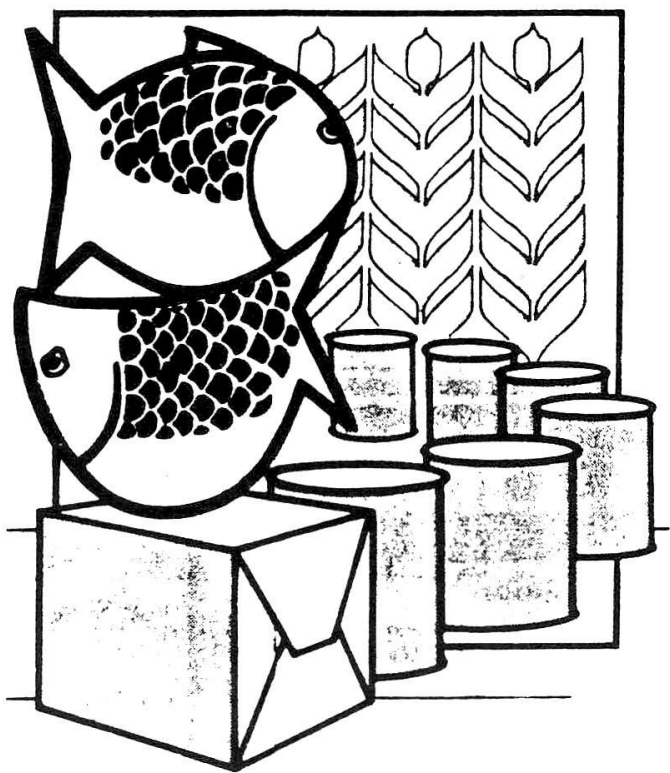
儒家的禮教和倫理傳統有利於社會的整

合，但也能導致它的自我封閉、缺乏創新，並淪於形式主義。

中國的傳統和基督宗教可以互相補充。中國的人道主義傳統，給予基督信徒一個成己淑人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倫理基礎。信仰一位超越的神，可助儒家的秩序由封閉和形式主義中解放出來。因此，基督徒與佛教徒道教徒也可舉行一些有建設性的交談，以淨化彼此的宗教態度。

對人全面發展的服務

梵二大公會議文憲「教會在世界牧職憲章」和教宗的其他通諭，都強調教會服務全人類的角色。很多非基督宗教的國家也很欣賞天主教學校能夠訓練出有責任感和開放的國民。全人教育仍然是教會的基本立場。此外，即使是教會學校，也必須在其所安排的課程內，加入某些為現代國家的發展有用的



科目。

訓練傷殘人士和提供醫療服務，就是教會尊重人性尊嚴和關心他們身心健康的具體表現。

基督徒對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貢獻，是爲了要促進大眾的福祉。他們對各地不同文化和政治環境的適應和投入，正好代表着各種不同的途徑去服務人類。法國主教團曾頒發了一個文件，名爲「基督信仰與政治」，指出基督徒對政治的抉擇有很大的自由。基督徒所採取的立場是他們個人對福音要求的回應：即尊重他人、關心正義和尊重團體的公共利益、自我犧牲、諒解、負責、忍耐和大公無私的愛心。

宣示超越的價值觀

在聖經中，先知們斥責不正義和人類彼此間的剝削，他們抨擊假仁假義的、自我中心的和壓迫的宗教態度。這種先知的角色在耶穌基督身上及在祂的訊息中達到頂峰。「天主的國」就是正義與和平的神國，它不屬於這世界；可是它也不是虛幻的夢想，因爲耶穌基督的門徒，必須爲他們信仰的真誠作見證，必須爲這神國的來臨而鋪路，悉力以赴。

基督徒應該爲轉化世界而努力，決不可因現有的成績而自滿自足，因爲天國的實現仍然是他們的堅固希望。如果一個政權真正是爲人民的公益着想，則信徒的批判態度將無損於這個政權。其實，他們對政權所懷的批判態度，不會對這樣的政權不利。

這先知使命必須由教會開始。教會禮儀年曆中的悔罪期、避靜神工、聖人的作證、神修和福音運動各種活動，均能提醒教會記憶自己的使命，並要求她不斷地自我革新。

結論

面對中國文化的特徵，教會很難迅速地解決她與中國之間的各種問題。西方世界在這二十個世紀中的經驗當然可以提供一些反省的機會，但却不能供給現成的解決方案。

在中國方面，目前已不可能單憑馬克思批評宗教的有限觀點去看教會及其對社會的貢獻。只有深入的研究，才能逐漸認識宗教領域上的實情，包括：不同層面的宗教經驗，它對政治生活、文化和倫理的種種貢獻，以及為促進人的創造力、詩意、靈感和不斷革新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等。中國人所熟識的辯證理論，應該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宗教的積極和消極成份。所謂積極成份，是指有助於人類發展，而所謂消極成份，則是指引人入走向狂熱和出離正軌。

既然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尋求革新，它自然會檢討自己真正的意識型態。它對宗教的控制會否令自己吸收了某些宗教的態度呢？它所追求的科學方法是否已經變成了漠視事實的教條主義？中國目前是由國家控制一切，這種由政府掌權和賦予利益的情況，會否使政府與群眾隔離？飽受歧視和不義對待的人民，已對這個意識型態失掉信心，他們尋

找一個不會欺騙人的「信經」。共產黨由於批評基督宗教偏差和不忠實，反而幫助了教會，亦無意中擔任了先知和解放者的角色。可是因為它忽視了宗教的精神力量，而只着重於對現世的功用，它實在輕忽了信眾最深的動機。

中國共產黨一旦重新發現了它最初的科學的、民主的和人道主義的靈感，她在國家任務上的作用就會變得更為仁愛，而普世教會的領導組織與中國政府間的關係亦會較容易處理，從而表現出中國正對世界實行均衡的開放。倘若只為物質的利益而開放，則帶給國家的，只會是一些物質的利益，而追求財富與快樂的結果，只會令幹部腐敗墮落，令年輕一輩失掉方向。教會的精神方向既然不斷地注意到敗壞人性的尊嚴與和平的危機，所以中國的天主教徒如能接受教會的訓示，當能對自己國家的精神文明作出更輝煌的貢獻。

其實，中國的天主教會若能與羅馬再度聯繫，她不但可取得一個合法的地位，而且亦會增強她所期待的自主，因為，那時中國的信徒再沒有理由去拒絕國家的領導。這樣，在福音的修好精神內，合一必會逐步得以實現。（附註見本刊頁94。）